



湖畔讲坛

系列丛书之四

吸纳人文科学思想
共建教育智性基础

涵融当代学术精髓
同铸学院讲坛高度

人文传统

许江主编
HUMANISTIC
TRADITION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湖畔讲坛·系列丛书之四

人文传统

许江 主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传统 / 姜广辉等著.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3.10

(湖畔讲坛·系列丛书之四 / 许江主编)

ISBN 7-81083-273-5

I. 人... II. 姜... III. 人文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2687号

湖畔讲坛·系列丛书之四 / 许江主编

人文传统

著 者: 姜广辉等

责任编辑: 李振鹏 / 特邀编辑: 陈 平 / 封面设计: 成朝晖

责任校对: 石同兴 / 责任监制: 葛炜光

出版发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邮编: 31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5

版 次: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000册 字数: 385千

ISBN 7-81083-273-5/J·259

定 价: 38.00元

湖畔讲坛 · 系列丛书总序

重建讲坛的高度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许 江

1928年3月26日，初春的西湖，天空中飘荡着浅浅的温润的绿色，一辆黄包车从西泠桥后边烟树婆娑的民舍中匆匆而来，停在孤山前山的湖畔罗苑门前，车上走下来一位气度儒雅的瘦长老人，缓缓地走进罗苑狭长的楼门中。他正是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来参加刚刚建成的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典礼。紧接着，他面对三十余位教职员、七十余位学生，语气深长地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重要讲话：“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藉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

蔡元培先生一生数载旅欧研学，作为一代硕学通儒，曾遍览欧陆各大博物馆，深研世界文明史的演变，甚至还是美学研究的专家。他深知艺术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形态，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完备的知识和认知体系的意义。1912年4月，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了著名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注意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主张，并明确指出培养人才对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方面的要求。在“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又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中不要忘

记美术”，在《新青年》上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论文，引起海内外的注意。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的心目中，“美术”二字包含着相当宽的意义，泛指一切美的文学艺术和道德言行。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西湖之畔创立，正是他锐意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举措，同时，作为横跨中西界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先驱，蔡先生坚信办学一是应该有学术至上、思想自由的学术气度，力主在学术上“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应该强调欧洲的人文教育思想，把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作为奋斗目标。蔡先生在艺术院的开学典礼上发表《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讲话，对一个艺术的专门化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学校所寄予的精神思想，已经将一种庄重的学术使命作为立校之本、创业之基，托付给了一代年轻的创业者们。蔡元培先生以思想界、教育界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为新创的艺术学府，奠定了学术讲坛的高度。

艺术院建院之初的一代教授们大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这是一个年轻的艺术理想者的集群。一方面，他们中大多数人旅欧的学历、中西两个学域的开阔视野形成了不凡的志向和学术积累；另一方面，他们置身于中西文化冲撞和救国图强的精神理想之下的痛切思考，使他们具有激昂的改革的锐意。他们一腔热血、满怀热望，做学问，创杂志，办画展，创立“艺术运动社”，主持中国最早的高等艺术教育，带着艺术和思想的锐气，带着反封建斗士的勇力，涉入一个艺术学府对一个民族存亡和文化迁变所能起作用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积极投入艺术创作的同时，他们养成了讨论问题、著书立说的风气。他们一方面从振兴东方艺术、唤醒民族意识的艺术社会学方面着眼，纵论艺术作为人类优秀精神载体和发展动力的重要意义，痛陈

艺术衰微对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重影响；另一方面，从美术发展和艺术风格等具体问题入手，系统研究中西美术的殊异渊源和演进的形态，探索和思考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教育的诸多问题。这个现象，在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史上被称为“理论热”，它作为艺术家涉入文化研究的一种集群现象而备受大家的重视。1999年，当郑朝先生编撰《西湖论艺——林风眠及其同事艺术文集》并嘱我写序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艺术学府在它初创期所曾经涌动的人文关怀的热力；感受到我们的精神家园的一代拓荒者所开掘的不凡的学术疆域；感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主掌着我院的学术宗旨并得以代代相传的精神脉络。正是这个优秀的教授集群，从一开始就以浓郁而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在理想与现实、开放与固守、为人生与为艺术等深刻的矛盾中，求取两端理想化的结合，坚持着追求一个学术的理想：以时代的精神，广泛吸收各派所长，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去表现东方的意境和情韵，创造东方新兴艺术。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而深情回望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代教授们以毕生的追求，以一世的心血所铸造的我院学术讲坛的高度。

二

七十多年过去，中国的艺术教育已经发生了变化。美术教育正在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这一环与传统文化的执守和现代艺术的拓展、与国民素质教育和青少年一代的精神塑造、与全球化步步逼近的背景下的种种文化研究和创造的课题，更加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备受社会与学界的关

注。同时，美术学院作为一种教育的特殊形态，一种迥然不同于一般大学知识传授方式的教育模式，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随着大众文化的急骤节拍和传媒时代的潮流风尚，美术教育似乎成了一种“教育另类”的旗帜，越来越吸引着一大批崇尚个性发展的青年，美术学院在文化课成绩上降格以求的现象，使得美术学院在那些中学教育中遭遇某种“困境”而又具备了某种潜质的学生们那里，被窃引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如何看待这个事实，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稍稍把这个话题展开，我们将面对更深的的一个层面的思考：艺术创造与一般的知识模式有着多大程度的异同？或者说，在抛弃艺术被一再地渲染成点石成金的神话假象的时候，艺术距离常态的智性模式有多远？

早在古希腊时期，美术犹如其他手工匠，被视为“一种制作的知识和技能”。希腊人始终十分重视“看”的行为，并开始把对事物的感受直观地注入作品之中。哲人苏格拉底，这位石匠之子在思考艺术品与其他工艺制品的区别时，认为“模仿是绘画和雕塑这类艺术的基本功能”。柏拉图继承其老师的模仿说，进一步指出艺术之模仿自然，与理念世界隔了三层。柏拉图似乎否定了艺术，却消极地显示了艺术似乎无法企及的目的和性质。亚里斯多德则从普遍与特殊的辩证之中，揭示出自然事物的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关系，并将艺术视作理解世界的一种体系。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无论有怎样的异同，却都共同地构筑了艺术科学和艺术哲学思考的根基。同时，这些关于“可见”与“不可见”的论争，也进一步深化着艺术行为中“看”的意蕴。尤其在亚里斯多德那里，“看”就是理解，是思想的可能性的存在。

在这里回顾这些，实际上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开始，艺术就一方面具有了形而上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保持着自己的本质特性：视觉的直观性。正是这两者，共同铸造了艺术的特殊的智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由于这两者的偏颇，常常酿成艺术发展的危机。比如：在 19 世纪末以前，艺术的视觉直观性常常不被视作艺术的本质特性，艺术创作受制于各种非视觉因素。但是在那之后的近现代艺术迅疾发展的狂飚中，这种直观性却又往往被视作惟一可以辨认的标识，成为可被任意诠释和夸张无度地挥霍着的一个意念；甚至随着艺术本体性的超常规的嬗变，被不断地雕镂成一种假象：艺术越远离智性常态就越有“希望”。现代艺术史的上空充斥着太多被塑造而成的非理性的“天才”形象，艺术几乎被这些形象诱入狂热的疯人院。

的确，艺术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智性方式，这种智性方式在于人与世界不可分的整一浑沌的境域，在于“看”的瞬间物我交融、相即相忘的那种难以言说的状态。但它绝不是那种绝圣弃智的怪人、狂人的专利，也不是缺少思想的手工艺匠的代名词。它自成系统却绝不孤立；它有明确的价值体系却从不封闭。在创造的道途上，它曾被视为异端，但绝不以异端自诩；在面向世界不断诘问的过程中，它摒弃一切陈辞滥调，却因此倍加珍视疑难和思考的重要性。它是与言说的方式判然有别却又彼此相通的道途；它是人类与世界沟连的、能够达到公共性显现层面的独特的思之方舟。

今天的麻烦也许是我们同时正在遭遇另一种偏颇：我们所处的正是一个特异的年代，新的图像技术以一种连续不断的衍生方式，永无止境地繁殖着，图像泛滥造成图像贬值。在这个系统之中，一切进入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一个不断地替换、

无止境地转挪的世界，一个主体性不断地被怀疑和动摇的世界。艺术的“观念性”却成了这个动荡汪洋中的渡海方舟，随之而来的是对作品过度的诠释和误读。艺术的观念化倾向正从另一角度消耗着艺术的直观原则，艺术品自明的正当性受到严峻的挑战，作品的诠释代替了作品的“被看”。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种观念化倾向越来越被作为一种艺术再生的可能前提而不断受到鼓励和重视。

事实上，前述的两种倾向，无论是艺术的非理性倾向还是观念化倾向，都是对艺术作为一种以“看”为基本形态的特殊智性方式的认识不足。今天的艺术教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正是要建立这一智性方式的结构基础，并以此来重建美术学院的讲坛的高度。这里讲“重建”，并不是说我院美术讲坛的高度已经失落，而是针对艺术学院的专门化教学所可能或正在出现的知识偏颇和视野狭化的现象，提出必要而及时的警觉，并强调要以创建我院的一代教授们的那种精神来再造艺术讲坛的学术高度。

秉持这样的想法，从 1999 年开始，中国美院研究学部连续举办了“人文思想与艺术”的系列讲座，诚邀全国各人文学科的专家学者来杭讲学，并将讲座的文稿辑集而成“湖畔讲坛”丛书。我们殷切希望借取海内外专家和学者的思想，含融当代学术人文的精髓，同筑中国艺术教育的智性基础，共铸今天美术学院讲坛的学术高度。

是为序。

2001 年 10 月 10 日于湖上南山

目 录

许 江：重建讲坛的高度（丛书总序）	1
姜广辉：新思想史：整合经学与子学	1
姜广辉：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	37
王 风：《周易》与易学	87
许抗生：略谈老子道家的智慧	119
吴 光：儒家思想的变革与创新	139
陈其泰：春秋公羊义	165
梁 涛：《论语》的结集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	201
王中江：从“德治”到“力治”	245
徐 斌：竹林七贤的社会关怀	279
朱汉民：宋明理学	309
方尔加：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方法	337
李存山：中国的气论自然观及其与西方自然观的比较	359
吴 锐：二论中国古代的山文化	383
张海晏：中国古代水文化研究	431
刘文英：中国梦文化	461
刘庆柱：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思想史概说	487
编后记	541



姜广辉

姜广辉，黑龙江安达人，1978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师从侯外庐先生修中国思想史。毕业后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主编、《朱子学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94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5 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代表作有：《颜李学派》、《中国文化传统简论》（合著）；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论文数十篇。

姜广辉

新思想史：整合经学与子学

一、以往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缺少“根”

近年一些国内和国外教授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朋友都感到找不到一种信实而又简明的教材,我对此也有同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缺少“根”,因为它们大都是以子学为纲的思想家列传,所采用的结构方法基本是以西方哲学的某种模式来剪裁中国思想史料。

思想史与哲学史本应有所区分,但在实际的操作中颇相雷同。此间之分辨与是非暂存而不论,如果一部中国思想史或一部中国哲学史若立意反映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的原貌,则不可不顾及中国古人智慧的着力之处及其固有之特点。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小史》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中国历史上诸种学问,其中有西洋所谓哲学之成分者,有先秦诸子之学,魏晋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及清人之义理之学。”¹“哲学”一词,其本义是爱智之学,西洋人的智慧有其表现的形式,即是西洋

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465页。

人的哲学；东洋人的智慧有其表现形式，即是东洋人的哲学，不必形貌相似而皆称“哲学”也。譬如西洋人与东洋人俱是人，若必似西洋之金发碧眼高鼻深目而谓之人，取其特点以衡量东洋人，则东洋人不成其为人也。东西方文明发展路径不同，其思想的表现形式及特点亦自然不同，惟各因原貌而照像写真，美丑妍媸，待人评说比较，始不致误人误己。学问本在求真求实，若东施效颦、照猫画虎，又岂是学问！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自《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以及后世关于经、史、子、集文献分类等等，有关传统的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很少有学儒家经典的。若一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不包括经学的内容，你能说它是信史吗？即以子学而言，中国思想家（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许多哲学命题所讨论的正是经学中的问题，你如果不懂经学，如何能正确的理解那些命题呢？所以我认为，如果一位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教授不懂经学，那他就没有资格讲授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

经学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就在于儒家经典是体现中国人价值观的文献载体。我们知道，人类是以族群的方式生活的，人们不仅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也同时生活在一定的人文生态环境之中。人文生态是指一个族群存续发展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其族群成员的“精神家园”，其核心内容就是该族群所信奉的经典及由此经典形成的价值观和生存样法。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生活样法的集中表现就是儒家的经典。这是儒家经学能够在两千年中存续发展的

根本原因。我们懂得了它，也就懂得了中国人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何以是这样的。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先要研究儒家的经学，对儒家经学有了一种正见之后，才能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有深入底里的了解。反之，一部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著作，若没有经学思想的内容，就等于没有了文化的根基和价值的本原，那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然而，经学又确是一门难度很大且很麻烦的学问，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许多学者也知道经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却望而生畏，不敢去碰它，于是避重就轻，单写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编纂在一起而名其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这个工作未免简单了一些。

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也另有其人，最有代表性的前辈学者当推皮锡瑞和马宗霍。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马宗霍著有《中国经学史》。我们对这一类著作也不能满意。此类著作的基本资料和问题意识来自于正史中的《儒林传》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彝尊的《经义考》等，将其中有关经学传承演变的资料串在一起，而略以己意评断。这类经学史著作只可视为经学传承史，它的要害是缺少“魂”，而关于经学的主旨，即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价值本原的重要意义，未曾有所揭示和阐扬。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批评的：

中国过去涉及经学史时，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这便随经学的空洞化而经学史亦因之空洞化。更因经学史的空洞化，又使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即使不考虑到古代传统的复活问题，为了经学自身的完整性，也必须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作郑重的申述，这里把它称为“经学思想”，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

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¹

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经学思想”即是关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徐复观先生呼吁开展“经学思想”的研究，并认为“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无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著作。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热衷于讨论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特点，大家参考了许多关于思想史、哲学史、经学史的著作，却得不出一种明晰的看法，其中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缺少“根”，而经学史著作缺少“魂”，因而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缺乏认识。

本文提出“整合经学与子学”当然不是将现有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和中国经学史著作简单地糅合在一起，那种缺少“魂”的经学史著作在这里很难派上用场。要整合经学和子学，首先要有一部像样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研究著作。有了这样的著作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整合经学和子学的工作。

综上所述，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我们应该丢掉“东施效颦”式的思想方法，写出透着中国精神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即以意义的信仰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

1.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湾学生书局，1982 年，第 208 页。

二、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原

此节我们探讨这样几个问题：经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我们为什么要把经学纳入思想史之中？我们应该如何开展经学的研究？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书籍，史称孔子曾对之加以删修整理，后世儒家乃至一般国人尊称之为“六经”。由于到汉代时《乐经》失传，汉以后人们又称“五经”。后来儒家经数续有增加，至宋代则增为“十三经”即在《诗经》、《尚书》、《周易》之外，礼分为《仪礼》、《礼记》、《周礼》三礼，《春秋》有《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三传，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而成十三经之数。宋代又有“四书”之目：《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同样有经典的重要地位。中国文化常言“六经”、“五经”、“十三经”、“四书五经”等等，所指即是这些儒家经典。所谓经学，即是关于这些经典的训诂注疏、义理阐释以及学派、传承、演变等等的学问。古代书目分为四大类：经、史、子、集。经部书籍即属于经学范围，此外，史部、子部、集部书籍中论及儒家经典的资料内容，也都属于传统经学的范围。一般说来，经学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学术层面，古代经籍由于时代变迁等原因，已使后人难以读懂，需要经师加以文字训读；而经书中涉及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名物制度，也需要对之加以注解；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亦需经师作义理阐释。此外，关于经学学派、传承、演变的研究等等都属于学术层面。二是信仰层

面，在古代，“经典”二字，不是可以滥用的，它特指圣贤所作之书，是人们尊信奉行的人生箴言。“经”有“常”的意义，是人类社会的常行之道；“经”也有“法”的意义，人们通常说“大经大法”，即有必须遵照执行的意思。对经典尊奉是通过经典价值观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这属于信仰的层面，也可以说属于价值的层面。

经学向称难治，司马谈《六家要指》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事，当年不能究其礼。”¹《汉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²汉代有人曾经问扬雄：“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欤？”扬雄回答：“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郭。”³近代钱玄同说：经学是“一团最浓最重的迷雾。”⁴确实，经学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的陷阱，处理不当，就会陷溺于其中。但解开中国文化之谜的钥匙也正在其中。

其实，古人已指出治经学的正确方法，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⁵即治经学不是为了注经，而是为了实践，不需要遍览传注之书，只要把握经文的“大体”即主旨就可以了。这话对我们今天研究经学也有意义，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和把握经学。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这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生活于

1.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 班固，《汉书》卷三十。

3. 扬雄，《法言·问神篇》。

4. 《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80页。

5. 班固，《汉书》卷三十。